

guide

帕特里克·海登 (Patrick Hayden) 编
陈高华 译

阿伦特：关键概念



重庆大学出版社

阿伦特： 关键概念

Hannah Arendt: Key Concepts

帕特里克·海登 (Patrick Hayden) 编
陈高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伦特:关键概念/(英)帕特里克·海登
(Patrick Hayden)编;陈高华译. —重庆:重庆大学
出版社,2017.4

(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

书名原文:Hannah Arendt: Key Concepts

ISBN 978-7-5689-0433-9

I. ①阿… II. ①帕…②陈… III. ①阿伦特
(Arendt, Hannah 1906—1975)—政治哲学—哲学思想—思想
评论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1278 号

阿伦特:关键概念

ALUNTE GUANJIAN GAINIAN

帕特里克·海登 编

陈高华 译

策划编辑:邹荣 任绪军 雷少波

责任编辑:邹荣 版式设计:邹荣

责任校对:邬小梅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mm×1168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27 千 插页:32 开 2 页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89-0433-9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作者介绍

伊丽莎白·弗雷泽(Elizabeth Frazer) 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主任,新学院政治学研究员。她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政治生活的规范观念,发表了一些有关政治的概念、政治教育的论文,同时与金伯利·哈钦斯(Kimberly Hutchings)合作出版了论述暴力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著作。

卡琳·弗莱(Karin Fry) 威斯康星大学斯蒂芬斯角分校哲学助理教授。她的专长是十九、二十世纪大陆哲学,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以及艺术哲学。她是《阿伦特:迷途指津》(*Arendt: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2009)一书的作者,以及《哲学论题》(*Philosophical Topics*)“阿伦特著作卷”的共同编者。她的研究兴趣还包括公共哲学、宗教与政治,以及哲学与大众文化。

艾腾·贡多杜(Ayten Gündoğdu) 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她的研究主要是援引现当代政治思想资源来处理颇具挑战性的人权问题和移民问题。她的论著主要是发表在

《当代政治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欧洲政治理论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和《法律、文化与人文》(*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上的文章,现在她正撰写一部著作,内容是用阿伦特的思想来审视当代移民的权利斗争。

帕特里克·海登(Patrick Hayden) 圣安德鲁斯大学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教授。他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邪恶:阿伦特与国际关系理论》(*Political Evil in a Global Age: 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2009)和《世界主义的全球化政治》(*Cosmopolitan Global Politics*, 2005)的作者,以及《Ashgate 伦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指南》(*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9)的编者。他的研究集中于国际政治理论、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人权与全球化政治中的正义/非正义问题。

安娜贝尔·赫佐格(Annabel Herzog)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部治理和政治理论系高级讲师。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阿伦特、列维纳斯、加缪和德里达。她编有《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与恶之平庸》(*Hannah Arendt: totalitarisme et banalité du mal*, 2011),著有《不同的政治考量》(*Penser autrement la politique*, 1997),此外,她还发表了大量关于伦理、政治和解释学的论文。

西沃恩·卡塔戈(Siobhan Kattago) 爱沙尼亚塔林大学哲学系教师。她的研究兴趣包括集体记忆与政治哲学,著有《含糊的记忆:纳粹的过去与德国的民族认同》(*Ambiguous Memory: The Nazi Pa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2001)和《当代欧洲的记忆与表征:过去的持存》(*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Europe: 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 2012),目前,她正在编辑《Ashgate 记忆研究指南》(*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Memory Studies*, 2014)。

道格拉斯·B. 克鲁斯梅尔(Douglas B. Klusmeyer)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法学双料博士,曾任职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现任教于美利坚大学司法、法律和社会系,同时也是历史系的附属成员。他出版了大量关于公民身份和移民政策问题的论著,当前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一般的法律问题和国际政治理论问题,具体则集中于对汉娜·阿伦特的研究。

玛格丽特·拉凯齐(Marguerite La Caze) 昆士兰大学哲学助理教授。她著有《惊异与慷慨及其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作用》(*Wonder and Generosity: Their Role in Ethics and Politics*, 2013)、《分析的想象》(*The Analytic Imaginary*, 2002)、《正直与脆弱的自我》(*Integrity and the Fragile Self*, 2003;与戴米安·科克斯[Damian Cox]和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e]合著),此外,她还发表了大量论文,涉及的思想家有阿伦特、波伏瓦、德里达、弗洛伊德、伊利格瑞、康德、米什莱·勒多夫(Michèle Le Dœuff)、萨特和艾里斯·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

小安东尼·F.朗(Anthony F. Lang, Jr) 他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拥有国际政治理论教席,主持一个全球宪政主义中心。他的教学和研究集中于全球层面、中东地区的法律、政治和伦理的交叉部分,尤其关注宪政主义概念,著有《惩罚、正义与国际关系:冷战后的伦理和秩序》(*Punishment,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hics and Order after the Cold War*, 2008),(与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共同编有《阿伦特与国际关系:跨界读本》(*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ding Across the Lines*, 2005)。

玛莎·罗维叶(Maša Mrovlje) 任教于圣安德鲁斯大学,也是该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她的研究兴趣大致在国际政治理论和政治

思想史领域,尤为关注 20 世纪的生存哲学及其对当代世界中政治判断、自由、责任、批判和转型正义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的意义。

拉斯·伦斯曼(Lars Rensmann) 意大利罗马约翰·卡波特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他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国际政治思想、批判理论和全球政治及欧洲政治,近来的著作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与反犹太主义》(*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Antisemitism*, 即出)、《阿伦特与阿多诺:政治研究与哲学研究》(*Arendt and Adorno: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与萨米尔·甘德沙[Samir Gandesha]合编,2012),以及《游戏世界:体育在如何重构全球政治和文化》(*Gaming the World: How Sports are Reshaping Global Politics and Culture*, 与安德雷·S.马科维茨[Andrei S. Markovits]合著,2010)。

保罗·沃伊斯(Paul Voice) 在贝宁顿学院教授哲学。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正义问题、应用政治哲学以及浪漫爱情的哲学,近来发表的作品有《被解释的罗尔斯》(*Rawls Explained*, 2011)、《非正义的噪音》(*Unjust Noise*, 刊于《北欧应用伦理学杂志》[*The Nordic Journal of Applied Ethics*])以及《爱作为情感契约的权威》(*The Authority of Love as Sentimental Contract*, 刊于《哲学论文》[*Essays in Philosophy*])。

菲利普·沃尔什(Philip Walsh) 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哲学,著有《怀疑主义、现代性和批判理论》(*Skepticism, Modernity and Critical Theory*, 2005)。他最近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为了社会科学的未来去看待阿伦特和埃利亚斯作品的意义。

目 录

作者介绍 / iii

导言：阐明阿伦特 / 1

帕特里克·海登

第 1 部分 论人的境况

1 新生性 / 25

卡琳·弗莱

2 劳动、制作与行动 / 41

保罗·沃伊斯

3 阿伦特论世界 / 61

西沃恩·卡塔戈

4 叙述与理解 / 79

玛莎·罗维叶

第 2 部分 论现代性的 危机

5 极权主义与恶 / 103

拉斯·伦斯曼

第3部分

论政治与公共世界

- 6 无国籍与拥有权利的权利 / 127
艾腾·贡多杜
- 7 阿伦特论社会性 / 145
菲利普·沃尔什
- 8 阿伦特论权威与传统 / 161
道格拉斯·B. 克鲁斯梅尔
- 9 权力与暴力 / 181
伊丽莎白·弗雷泽
- 10 阿伦特与判断的政治力量 / 195
帕特里克·海登
- 11 责任 / 215
安娜贝尔·赫佐格
- 12 阿伦特与革命问题 / 229
小安东尼·F. 朗
- 13 承诺与宽恕 / 245
玛格丽特·拉凯齐
- 生平和著作年表 / 261
- 参考文献 / 265
- 索引 / 283

阐明阿伦特

◎ 帕特里克·海登

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汉娜·阿伦特，可以说是20世纪最具才华的思想家之一。她不仅是20世纪思想舞台当中独立不羁、学识渊博的人物，也是那些关乎人文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概念最有影响的贡献者之一。她的研究范围极广、路径不拘一格，涉及的问题有自由与责任、暴力与革命、战争与极权主义、社会异化与技术癖、想象与判断、参与式政治与公民不服从，以及人类生存的意义本身。她的全部作品包括复杂费解却别具一格的哲学和政治理论著作，数以百计的论文、访谈和演讲，论题涉及历史、哲学、文学和文化，此外，还有较为私密的来往信件和观察敏锐的新闻报道。作为一个写作者和公共人物，阿伦特被人广泛阅读，而且常常引发争议；她那不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和那些独特的作品，既吸引了大量充满激情的拥趸，也招来了同样强烈的批评者。最重要的是，阿伦特的思想和概念为的是突显那些使现代世界发生转变且常常晦暗不清的过程，强调我们各自以及共同要面对的大挑战；说到底，她的思想和概念是对世界的观察，这个世界正奋力地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寻找出路。

在这篇导言中,我叙述了阿伦特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借此表明她的亲身经历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她的那些哲学文本和政治文本的决定性基础,同时也为读者们进入她的著作提供几个路标。

- 2 其间,我也会考察阿伦特的哲学感觉如何从现象学-存在主义传统中生发出来。当然,由于现代性处境下政治之命运这个急迫的问题,她的这种哲学感觉发展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声音。接着,我会处理几个核心论题,它们源自阿伦特对人类生存的那种常常悖谬性特征的反思,以及她对既日益恶化又日益集权的境况(对此种境况,人类必须加以回应)的理解尝试。

生平概述

阿伦特 190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德国的汉诺威,在哥尼斯堡长大,当时的哥尼斯堡是东普鲁士的首府,如今它成了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¹ 阿伦特的曾祖父母和曾外祖父母都是受德国犹太人免于遭受反犹太主义大屠杀前景的吸引,在 19 世纪从俄罗斯迁移到哥尼斯堡的。她的父亲叫保罗·阿伦特(Paul Arendt)、母亲叫玛莎·科恩(Martha Cohn),都是有教养的人,他们一家是典型的职业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属于中产阶级商业共同体的稳定成员,而且,她的父母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在孩童时期,阿伦特就身处反犹太主义的氛围之中,不过她母亲一直跟她说,一定要保护自己,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尽管“‘犹太人’一词从未在家中提起”,阿伦特曾这样谈到(Arendt 1994: 7-8),但同化了的阿伦特一家也从未否认如下事实,即他们“生来”就是犹太人,并且一直与犹太教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在阿伦特的一生中,

1 扬-布鲁尔(Young-Bruehl 2004)的传记,仍是英语世界唯一全面研究阿伦特生平的著作。

对于犹太认同问题,以及更为宽泛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问题,她都时有探究。

阿伦特7岁那年,她父亲保罗在久病之后去世。1914年8月,由于俄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进攻哥尼斯堡,阿伦特与母亲逃到了柏林,但是,当德国军队击退了这次进攻之后,她们又在同年未设法回到了哥尼斯堡。阿伦特是一个早熟、坚毅而且极为聪明的少女——用她母亲的话说,“难以相处、神秘兮兮”(Young-Bruehl 2004:36)——她在学习上很活跃,很早就接触到了古典语言、哲学、神学、文学、历史和诗歌。在通过要求极高的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德国中学生进入大学所要求的毕业考试)——尽管她因“反叛性地”抵制某位老师的课程而被开除——之后,阿伦特1924年秋天在马堡大学注册入学。在那里,她跟随受人尊重的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学习神学,最为重要的是,她跟随马丁·海德格尔学习哲学。那时,海德格尔在学生中获得了如下声誉:一个才华横溢的开创性思想家,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激进的现象学批判,他能够一扫后康德主义哲学的阴霾,让原创性的思考“重新焕发生机”(Young-Bruehl: 49; 也可参看Arendt 1971)。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彼此都为对方深深吸引,不久开始了一段秘密的恋情,可惜好景不长,只持续到1925年夏天就结束了。海德格尔后来说,他在撰写1927年出版的杰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期间,阿伦特是他的灵感之源(Young-Bruehl 2004: 50)。

在下定决心断了与海德格尔的恋情后,阿伦特在弗赖堡大学待了一个学期,跟随海德格尔的老师和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学习,后者是哲学现象学流派(现象学致力于对活生生经验的结构及其主体维度的反思性描述和分析)的领袖人物。随后,她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来到了海德堡大学跟随卡尔·雅斯贝尔斯学习,后者起初是个生理学家,后来转变成了一个哲学家,他提出了一种

Existenzphilosophie(生存哲学),这是“阐明生存”和人的自由的一种现象学-生存论尝试(Arendt 1994: 183)。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阿伦特1928年以一篇关于圣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阿伦特认为雅斯贝尔斯对自己的思想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让她意识到如何把人的生存与人际间的对话、实践和政治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此后,她与雅斯贝尔斯之间形成了一种持续终生的亲密友谊,前后四十多年。

1929年,阿伦特来到柏林,在那里她遇到了哲学家君特·斯特恩并与之结婚,那一年,她还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阿伦特在进行德国浪漫主义研究的同时,还着手撰写一部关于拉埃尔·瓦恩哈根的传记,后者是19世纪早期的犹太作家、社交女性和沙龙主人(salonnière)。1933年阿伦特就完成了关于瓦恩哈根传记的大部分手稿,但是,由于当时德国恶化的社会和政治处境,这一传记未能完成,一直到1958年才成书出版。由于希特勒在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以及同年2月的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发生,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紧急状态令或“授权法案”,授权希特勒有权中止公民自由,可以经由命令通过法律。在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阿伦特在政治上变得积极,不顾法令,把自己的公寓当作共产党和犹太的政治人物逃避希特勒政权的中转站。她的丈夫君特·斯特恩就是那些被迫逃离的人之一,他在国会大厦纵火案后盖世太保开始清除左派之际去了巴黎。阿伦特则仍待在柏林,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为她的朋友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布鲁门菲尔德是犹太复国主义德国联合会的秘书长——进行秘密研究,目的是搜集德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商业团体和专业协会的反犹言论。随后,阿伦特因这一工作被逮捕,在柏林警察局审问了八天。释放后不久,她与她的母亲在没有任何旅行证件的情况下逃离了德国,先是逃到布拉格,然后到日内瓦,最后到了巴黎,在巴

黎,阿伦特作为“无证”难民生活了七年(Arendt 1994:5-6; Young-Bruhl 2004:105-7)。

对于阿伦特而言,巴黎的那段时间是她在思想和政治上集中成形的时期。如果说1933年标志着阿伦特深刻的政治意识的觉醒——她认识到“漠不关心已不再可能”,而责任则意味着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Arendt 1994:3)——那么接下来的这七年则代表着她的政治哲思的逐步成熟。尽管对阿伦特来说,作为难民在巴黎生活极为艰难,这导致了她与君特·斯特恩在1936年分离,但那里也有文化和政治上极为厚实的世界主义环境。尽管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因素极为不满,但阿伦特仍热情地为好几个巴黎的犹太组织工作,帮助移民和难民儿童定居巴勒斯坦。那时,她完全领会了母亲在小时候对她的教导的意义,因此在谈到自己为何会积极参与其中时她说:“如果一个人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受攻击,那他就必须以犹太人的身份来为自己辩护……我想要做些实际工作,而且只做与犹太人有关的工作”(Arendt 1994:12)。阿伦特也认识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同为流亡者的瓦尔特·本雅明和贝尔托·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一些人,比如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让·华尔(Jean Wahl)、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或许,最为重要的是,阿伦特在1936年遇见了非犹太的德国政治难民海因里希·布吕希尔。布吕希尔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是罗莎·卢森堡领导的革命的斯巴达联盟的活跃分子。虽然有一个无产阶级的背景,而且没接受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正式教育,但布吕希尔却是一位很有智慧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后,阿伦特从布吕希尔那里学到了很多政治领域的事,而布吕希尔则从阿伦特那里学了不少哲学和政治理论。他们俩1940年1月结婚,此后便一直是彼此忠诚的伴侣、朋友和合作者,直到布吕希尔在1970年10月去世。

1940年5月,维希政府把大量的无国籍人和难民(主要是德国犹太人)归为“帝国侨民”,把他们关入集中营。因此,阿伦特被迫与布吕希尔分开,并被关入法国西南部的古尔集中营。由于感到严重危险,阿伦特设法在当年七月逃离集中营,并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竟很幸运地与布吕希尔重逢,布吕希尔也是设法从他所在的巴黎郊外的集中营逃出来的。在经过了几个月的逃亡生活之后,阿伦特和布吕希尔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紧急护照。随后,他们必须到里斯本,在那里等了三个月才于1941年5月安全到达美国纽约(Young-Bruehl 2004:152-9)。十年后,阿伦特成了美国公民。

在纽约生活的最初一段时间,也是很艰难的。适应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找工作以及学习新的语言,诸如此类都要经受无数的挑战。阿伦特先是在一家德语报纸《建设报》(*Aufbau*)任专栏作家,期间她发表了大量揭露欧洲犹太人受迫害和最终解决扩大化的文章,同时,她还兼职做教师,之后,她在1946年担任了肖肯丛书(Schocken Books)的高级编辑。1940年代中后期,她也为欧洲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工作,后者的任务是确定纳粹占领欧洲期间掠走的重要文物,以便归还和复原。正是在这一时期,阿伦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得她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出版,这也是她的第一部用英语写就的作品,即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们对于这本著作的态度,既有赞许,也有批评。有些批评者集中于阿伦特在历史方法论上的缺陷,另一些批评者则不满于阿伦特给予纳粹主义的关注太多,与斯大林主义相比太不成比例(Baehr 2010)。无论如何,它是最早分析“极权主义的主要因素”的著作之一(Arendt 1994: 403),并且历史地说明了它的“史无前例”性质,是至今尚无法想象的一种现象。

由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大体上得到了正面评价,阿伦特的学术声誉开始扩展开来,从德国移民的小圈子进入了美国学界

的网络和机构。1952年,阿伦特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Guggenheim Foundation fellowship),开始了一项研究计划,她设想借此充实马克思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联,而这一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只有简单提及。在随后的几年里,阿伦特在一些机构发表了一系列高调的演讲,比如芝加哥大学、圣母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些演讲不仅阐述了她对马克思的批判,而且提出了她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性审问,以及这一传统向来对于言说和行动这两种政治自由的敌意。1955年,她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教授,1959年,她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阿伦特以其一贯不留情面的“刻薄”方式说这是一所“出了名的势利眼大学”;Young-Bruehl 2004: 272)的全职教授。阿伦特的第二本重要著作,即《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出版于1958年,它对公共-政治事件如何构成一种适宜的人类生存,进行了阐明。

在1953年7月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她抱怨说,“要是我对恶的问题了解得多些就好了”(Young-Bruehl 2004: 287)。1961年,阿伦特如愿以偿,被《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派作记者去报道在耶路撒冷进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是党卫军的中层军官,在大屠杀或浩劫期间负责把欧洲犹太人有序地送往纳粹的死亡集中营,被阿伦特用来表明恶的“平庸”。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把灭绝营称为“根本的”恶,但在1963年5月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她尽力所阐述的问题则是,恶如何由那些“缺乏思考地”参与到国家政策之执行或忠诚地追随国家政策的看似正常的个体造成。阿伦特的论点随即引爆了大量的争议和敌意。一些批评者认为,“恶的平庸”这种说法让最终解决这一骇人的暴行变得微不足道,而另外一些批评者则更加直接,谴责她是在谴责犹太受害者,因为她还分析了犹太委员会曾在这场大屠杀中与纳粹官方

合作(Arendt 2007a: 465-511)。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阿伦特专注于一系列相互勾连的概念,从政治的恶如何发生这个极其真实的问题来看,它们有深刻的道德和政治意蕴,比如思考、判断、责任、权力、暴力、意见、复多性、传统与革命。她的许多反思都受到了让美国社会和政治环境变得暗淡的危机的激发,其中包括种族隔离和公民权斗争、越战和水门事件丑闻。在这段困难重重但也极为高产的时期,阿伦特出版了

7 《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 1961)、《论革命》(*On Revolution*, 1963)、《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 1968)、《论暴力》(*On Violence*, 1970)和《共和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 1972)。

在赢得了杰出的学术声誉之后,当然也有许多恶名,阿伦特1967年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谋得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她也获得了认可其一生工作的公共嘉奖,其中包括大量的荣誉学位、1967年的德国语言和文学学会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奖、1969年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的爱默生-梭罗奖章,以及1975年为其对欧洲文明的贡献而颁发的松宁奖。1973年,阿伦特应邀主持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著名的吉福德讲座。在这一系列讲座中,阿伦特介绍的内容,按计划是一本考察三种明确的心灵活动——思考、意愿和判断——以及提出其对于思考与政治之间联系的书。然而,阿伦特的这本书终究没能完成。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死于心脏病发作,其时她正在纽约的寓所接待朋友。《心灵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在她死后于1978年出版。

阿伦特的现象学-生存论感受性

1964年10月,阿伦特接受记者君特·高斯(Günter Gaus)的电